

# 叙事与意识形态

陈然兴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叙事与意识形态

陈然兴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余 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与意识形态 / 陈然兴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01-011466-8

I. ①叙… II. ①陈… III. ①叙述学-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402 号

**叙事与意识形态**

XUSHI YU YISHI XINGTAI

陈然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466-8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建设项目

陕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

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文艺学教学团队”项目建设

西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支助出版

# 目 录

|                           |    |
|---------------------------|----|
| 导 论 .....                 | 1  |
| 第一章 叙事批评方法论 .....         | 9  |
| 第一节 叙事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与心理主义 ..... | 11 |
| 一、叙事学与叙事批评 .....          | 11 |
| 二、叙事学中的形式主义 .....         | 15 |
| 三、叙事学中的心理主义 .....         | 23 |
| 第二节 叙事批评的客体与方法 .....      | 27 |
| 一、叙事活动诸层面 .....           | 27 |
| 二、文本与语境 .....             | 36 |
| 三、结构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 .....       | 50 |
| 第三节 批评的意识形态性 .....        | 57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 .....     | 65 |
| 第一节 阿尔都塞之前的意识形态理论概述 ..... | 66 |
| 一、作为虚假意识和歪曲反映的意识形态 .....  | 66 |
| 二、作为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 .....       | 71 |
| 三、作为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   | 76 |
| 第二节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影响 .....  | 81 |
| 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 .....     | 81 |
| 二、意识形态是想象关系的表征 .....      | 84 |
| 三、意识形态把个体质询为主体 .....      | 88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    | 95 |
| 一、文本与意识形态 .....           | 95 |

## 2 叙事与意识形态

|                          |     |
|--------------------------|-----|
| 二、意识形态批评作为强力重写 .....     | 107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批评与宏大叙事 .....    | 113 |
| 第三章 叙事机制与意识形态 .....      | 129 |
| 第一节 叙事的时间机制 .....        | 132 |
| 一、从阿尔都塞的一篇剧评谈起 .....     | 134 |
| 二、叙事时间作为辩证时间 .....       | 138 |
| 三、叙事时间与历史 .....          | 144 |
| 第二节 叙事的因果解释机制 .....      | 151 |
| 一、情节化 .....              | 151 |
| 二、叙事因果、“常识”与意识形态 .....   | 156 |
| 第三节 叙事的矛盾—解决机制 .....     | 159 |
| 一、矛盾—解决与欲望:叙事动力的问题 ..... | 160 |
| 二、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 .....      | 167 |
| 第四节 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之范式的叙事 ..... | 175 |
| 一、叙事闭合 .....             | 177 |
| 二、叙事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范式 .....    | 182 |
| 第四章 叙事的界限与条件 .....       | 188 |
| 第一节 不可叙述之事 .....         | 188 |
| 一、阿尔芬论大屠杀之不可叙述性 .....    | 188 |
| 二、沃霍尔论“不可叙述之事” .....     | 196 |
| 第二节 总体化叙事的衰落与复兴 .....    | 200 |
| 一、卢卡奇:史诗与小说 .....        | 200 |
| 二、卢卡奇:叙述与描写 .....        | 206 |
| 三、本雅明:故事、小说与消息 .....     | 212 |
| 四、大众文化中的总体化叙事与乌托邦 .....  | 216 |
| 第三节 寓言批评与遏制策略 .....      | 221 |
| 一、寓言与寓言批评 .....          | 222 |
| 二、总体化再现与遏制策略 .....       | 234 |
| 第五章 叙事形式与意识形态 .....      | 242 |
| 第一节 形式的内容 .....          | 242 |

|                          |     |
|--------------------------|-----|
| 第二节 视角与意识形态 .....        | 252 |
| 一、视角隐喻与主体性问题 .....       | 252 |
| 二、视角作为单子化时代的寓言 .....     | 256 |
| 三、视角与意识形态 .....          | 259 |
| 第三节 叙事文类与意识形态 .....      | 262 |
| 一、文类批评的界限与范围 .....       | 262 |
| 二、文类规约与意识形态素 .....       | 269 |
| 第六章 叙事与主体性的生产 .....      | 275 |
| 第一节 主体性批评的历史语境 .....     | 277 |
| 第二节 主体性批评的理论来源 .....     | 284 |
| 一、结构主义与主体的离心化 .....      | 284 |
| 二、精神分析与大写的主体 .....       | 288 |
| 三、意识形态质询中的主体 .....       | 291 |
| 第三节 缝合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性批评 ..... | 303 |
| 一、缝合的概念 .....            | 305 |
| 二、电影叙事中的缝合机制 .....       | 308 |
| 三、叙事再现与主体性 .....         | 311 |
| 第四节 受述者与主体摆位 .....       | 319 |
| 结 语 .....                | 328 |
| 参考文献 .....               | 334 |
| 后 记 .....                | 344 |

## 导 论

本研究是把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其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叙事活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一般性的研究。力图把叙事作为具体的社会话语实践来看待,重点讨论叙事活动与人的经验整合、历史书写和主体身份建构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从一种综合的问题意识出发,把叙事学的研究纳入到意识形态批评的框架之中,在吸纳当前叙事学之理论成果的同时,突破其问题框架,为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理论依据。

### 一

叙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既是一种话语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其作为话语方式来说,叙事即讲故事,它与抒情、说理相区别。无论在日常话语、文学艺术作品、历史著作、甚至哲学、宗教、政治言论中,我们都能发现“故事”的存在。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故事跨越国度、历史、文化而到处存在,正如生活本身一样”<sup>①</sup>。就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叙事即“情节化”(emplotment),它是人的记忆、认知、梦和幻想等活动内在包含的结构。“情节化”与人类的时间/历史意识相关联,一个个体通过把自身经验“情节化”,而后把自己的生存体验为“命运”;一个群体则通过把集体经验“情节化”,而后书写出“历史”;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正是通过叙事,人才把

---

<sup>①</sup> [法]罗兰·巴特:《叙事结构分析导论》,见《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 2 叙事与意识形态

自身体验为一个“过程”。可以说,叙事不仅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还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无怪乎马克·柯里(Mark Currie)略显夸张地说道:“叙事犹如普通语言、因果关系或一种思维和存在的方式一般不可避免”,即使把人看做是“叙事动物”也不为过<sup>①</sup>。

人类对叙事现象的思考由来已久,在中国先秦时代对历史“纪事”之“实录”原则的讨论中,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论述中,都包含有对叙事的思考。但是,对叙事活动的独立而系统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narratology)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的诞生激发了人们研究叙事的热情。到90年代,人文科学各领域先后把叙事的问题纳入自身的问题框架之中,形成了“叙事学转向”的壮观景象。由于叙事的问题直接关乎历史书写的问题,而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书写文化史,因此,叙事学给历史书写提出的问题成为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时至今日,叙事学已经成为人文领域各学科“重写该领域的文化史”所共享的理论资源<sup>②</sup>。

在目前的叙事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就是被包容在“叙事学”概念下的那些理论。众所周知,“叙事学”一开始是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是“结构主义诗学”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叙事文本之形式特征的分类和编目,以构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叙事语法”。这种理论仅仅把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看待,把叙事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对叙事文本的形式特征之分析和整理上,忽视了叙事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对叙事形式的历史性及其意识形态性缺乏研究。

由法国人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所创造的“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本身先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但是,对意识形态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的发现却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实践的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实践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有着重要意义。由此,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和一种独特的批评方法,那就是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

---

①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Narrative*, Vol. 1, No. 1 (Jan., 1993), pp. 45-58.

思主义进行社会文化研究和理论斗争的重要形式。以卢卡奇 (Georg Lukács)、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sup>①</sup>的学派,在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建构和实践方面成绩卓著。他们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路。在当今理论多元化的时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积极地影响着众多致力于介入政治的批评话语。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话语都不同程度地从意识形态批评中汲取资源。

意识形态渗透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叙事作为人类话语实践的形式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叙事的生产与消费是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观点并不单单存在于显明的政治口号或官方话语之中,它往往隐蔽地存在于大量的“日常叙事”当中。通过叙事,意识形态观点被自然化为不言自明的“常识”,从而被人接受;通过叙事,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英雄人物的事迹,被人膜拜,受人尊崇。究其根源来说,叙事话语因其独特的逻辑性和封闭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合法化、自然化的机制,从而成为了意识形态话语最基本的言说方式。如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所指出的,“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来说,叙事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叙事恰恰是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范式 (paradigm)。”<sup>②</sup>

其次,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对叙事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在总体上规范着“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就叙事的内容方面来说,意识形态界定着“可讲述”与“不可讲述”的界限,即特定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可以被讲述,哪些方面不可以讲述,哪些人的生活值得被讲述,哪些人的生活不值得被讲述;就叙事的形式方面来说,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组成

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由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于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冒险》一书中正式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和评价可见[英]佩·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② Hayden White: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3, No. 1 (Feb., 1984), pp. 1-33.

部分的“审美意识形态”从总体上决定着叙述者对叙事技巧的选择和配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某一些叙事技巧是不可想象的,某一些技巧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而另一些技巧则被广泛运用。叙事技巧的产生和运用取决于特定社会时代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倾向或“趣味”,并最终取决于社会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最后,叙事文本往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不仅表现为故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观点冲突,不仅表现为故事情节中的矛盾冲突,也表现为人物、叙述者、受述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往往由“视角”差异表现出来),甚至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不同人物话语之间的风格差异也往往具有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sup>①</sup>。总之,叙事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我们把叙事学看做是对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生产的研究,那么,意识形态批评就是对这种文化生产与其他生产,包括其他类型的文化生产以及物质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叙事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为我们论题的提出提供了依据。按照唐纳德·默顿(Donald Morton)的总结<sup>②</sup>,时至今日的叙事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新批评、审美主义和文本自治性为主导的时期,代表著作是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理论;第二阶段是经典叙事学阶段,也是力图把叙事学塑造为一种科学的阶段,罗兰·巴特的著作堪称范例;第三个阶段是后叙事学(postnarratological)阶段,由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对结构主义叙

---

① 苏联批评家巴赫金(M. M. Bakhtin)对小说中的“多声部”(polyphonic)现象的研究堪称该领域的鼻祖,在他的启发下,对叙事文本中的“声音”(voice)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始。可参见巴赫金的长文《长篇小说的话语》(见《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55页),研究文章有Alan Singer,“The Voice of History/The Subject of the Novel,”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 21, No. 2/3, Why the Novel Matters: A Postmodern Perplex Conference Issue (Winter-Spring, 1988), pp. 173—179; Monika Fludernik,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Voice, Focalization, and New Writ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2, No. 3, Voice and Human Experience (Summer, 2001), pp. 619—638; John Brenkman, “On Voice,”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 33, No. 3 (Summer, 2000), pp. 281—306; Brian Richardson, “Narrative Poetics and Postmodern Transgression: Theorizing the Collapse of Time, Voice, and Frame,” *Narrative*, Vol. 8, No. 1 (Jan., 2000), pp. 23—42.

② Donald Morton: “The Crisis of Narrative in the Postnarratological Era: Paul Goodman’s *The Empire City* as (Post) Modern Interven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4, No. 2, Reconsiderations (Spring, 1993), pp. 407—424.

事学进行解构为标志。在这最新阶段中,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叙事研究的“科学性”被质疑为一种“科学主义”。经典叙事学对文本的叙事形式的分析不再是研究的中心了,人们更多地关注叙事的社会和文化关联及其意义。人们更多地谈论的不再是“故事与话语”,而是“故事与语境”,也就是说,叙事文本不再单单就其自身内部去考察,而是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考察,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叙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维度。马克·柯里也认为,在后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ies)阶段,叙事研究中出现了“政治批评”勃兴的现象。他把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一种集体意向:将文本解读作为语言学知识或语言解读的讽喻;第二个阶段表现为讽喻的政治化,在文本中找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在第一个阶段中,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统统在语言的视野之中,而在第二阶段中,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统统在政治的视野之中。”<sup>①</sup>默顿和柯里的论述充分表明了,目前叙事研究的总体趋势中包含着一种对意识形态批评的诉求,我们的论题也恰好顺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

##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叙事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本研究的附属任务就是对这一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从而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叙事批评的理论脉络和总体轮廓。我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叙事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分水岭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理由有两个:第一,正是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才明确地被提出来,并出现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这样系统的著作;第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从而改变了意识形态批评的问题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才被开启出来。

在阿尔都塞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叙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小说研究

---

<sup>①</sup>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方面,代表著作有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和《历史小说》(1955)、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重要文章《讲故事的人》(1936)、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的《幻象与现实》(1946)、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什么是文学?》(1948)、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小说社会学》(1964)、巴赫金的《长篇小说话语》(1975)等等<sup>①</sup>。在这些论著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和叙事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小说叙事的时间形式的探讨;本雅明提出的叙事与经验的关系问题;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方法论”;巴赫金提出的小说叙事中的“多声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观点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叙事批评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一种明确的、系统的叙事批评理论尚未建立。

在阿尔都塞之后,伴随着叙事学学科的建立和繁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入到这一崭新的领域。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无疑是这一阶段最为辉煌的成果。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系统地建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叙事阐释理论,就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很多极具说服力的论断,因此这本书与詹姆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认知的测绘》、《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象征推断;或肯尼思·伯克和意识形态分析》等)一道成为本研究的支柱文本。此外,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尤其是被称作“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家们在叙事领域的探索也不可忽视。在叙事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上,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意识形态、虚构和叙事》一文中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叙事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形式”的重要论断。在叙事批评的实践中,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研究、米歇尔·丹宁(Micheal Denning)对“邦德叙事”的研究、卡娅·西尔弗曼(Kaja Silverman)对希区柯克电影叙事的分析,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对侦探小说的研究等,构成了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叙事文本批评的典范。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论方面,马歇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贝内特(Tony Bennett)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贝尔西的

---

<sup>①</sup> 这个书目是在我能够获得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选择出来的。就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小说研究的情况可以参看《诗学史》的相关论述([法]让·贝西埃、[加拿大]伊·库什纳等主编,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3—695页)。

《批评的实践》、西尔弗曼的《符号学的主体》、斯普瑞克(Michael Sprinker)的《想象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等著作,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就意识形态批评的问题框架、理论目标和政治介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赖以进行的重要理论资源。

当然,必须说明,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比如,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罗兰·巴特在《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中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就很好地结合了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热带的忧郁》中对“卡都卫欧文身图案”的研究更是把叙事的结构分析与社会学考察结合起来,这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另外,如海登·怀特、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对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在此就不详述了。

本研究主要针对经典叙事学的纯文本研究的不足以及传统意识形态批评的外在性而提出,力图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叙事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加以系统梳理,其最终目的也是为当前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设做出一点贡献。

庸俗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留下的历史伤痕至今难以愈合。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批评依然被认为是一种“还原论”(reductionistic),即把文学作品视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批评方法不外是从作品中寻找社会对应物或阶级对应关系,从而对人物和主题进行“进步”与“反动”的评判。如果这种偏见依然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摆脱苏联模式之后的新的发展做出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优秀品格,他们非常善于在新的理论环境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话语,广泛吸收和整合各种阐释方法和理论视角,并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从而不断充实自己的批评“武器库”。他们的理论发展表明,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只有通过更新才可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有效性,这一点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批评是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表明,在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形式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是对“深度”的怀疑,与之伴随着的是对一切被詹姆逊称作阐释的“深度模式”的抛弃,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批评。再加上“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提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意识形态批评已经丧失其合法性了。针对这种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当后现代主义者指责意识形态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时,他们也恰恰设定了“真实”,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批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因此,后现代社会事实上是一个亟须意识形态批评的时代。深度的消失不是某种理论的倾向所造成的,而是社会历史的经验形式本身造成的。在后现代社会中,物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类象”(Simulacra),即没有原本的摹本,纯粹的机械复制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上面已经发现不了任何“劳动”的痕迹,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人工制品的社会,那么,后现代社会可以称作是“类象”的社会。在这种更加隐蔽地“神秘化”了的社会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祛除物化所带来的种种神秘幻象。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后现代社会中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本研究也希望以叙事学为突破口,为当前的意识形态批评开启新的路径。

## 第一章 叙事批评方法论

在导论部分,我们确立了本研究的任务,即尝试在一种综合的问题框架内把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从而深入探讨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然而,按照一般的理解,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在方法论上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前者的方法论主要源自结构语言学,而后者则源于社会学;前者主张“文本中心论”,即就文本自身来研究文本,而后者则强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前者要探寻的是文本意义生成的内部机制,即文本之内的符号结构,后者要探寻的则是文本意义生成和流变的外部原因,即文本是如何被其生产条件所制约,并在消费的过程中被不断重写;前者强调文本分析的共时维度,并以一种“文本科学”为目标,后者则强调批评的历时维度,并把前者的目标视为一种“幻想”,一种“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或译为专家政治论)的意识形态。

那么,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论冲突的关键是什么?我想这要从双方对“语言”的认识说起。无论是叙事学还是意识形态批评,他们所面对的客体都是符号文本。对语言符号的不同认识是两种批评方法发生分歧的关键。我们知道,经典叙事学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部分,它对语言符号的看法直接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的影响,其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1)把共时性的语言结构(langue)与历时性的言语行为(parole)区分开来,强调语言结构的优先性;(2)语言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构成,两者的对应关系是随意的、约定俗成的;(3)能指的横组合(syntagmatic)与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是语言结构的基本方面。简单地说,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表意的能力在于语言结构自身,是能指的差异体系构成了意义,结构主义诗学的任务是在不同类型的符号文本中寻找那个作为意义生成之基础的,稳定不变的“符号结构”,这就是叙事学方法论的语言学基础。意识形态批评则不



同。马克思主义把语言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来看待,认为语言是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符号材料,它没有自足的存在。意义并不是来自于语言体系自身,而是来自于活生生的话语交际,是参与话语交际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着意义生成。可见,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都承认在文本意义生成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个规律是存在于符号系统内部的,是那个稳定不变的语言结构;后者则认为,这个规律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从综合的角度来看,语言结构、文本、社会历史语境三者构成了一个从内到外的嵌套结构<sup>①</sup>。在这个结构的里边,是静止不动的语言结构,文本是这一结构的不同表现;在结构的外边,是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语境,文本随着它的波动而变化;夹在两者之间的是被动的文本,它的意义被结构的向心力和历史的离心力撕扯的支离破碎。要想实现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就要把文本的共时分析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就必须打破这个结构与历史的二元对立,那么,突破点在哪里?

在结构与历史的二元僵局中,存在着一个被动的文本,这就是突破点。在结构语言学的视野中,文本是不透明的符号堆积物,它等待着被“解码”;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文本是透明的,它要么是作者意识的表达,要么是社会历史的“再现”。尽管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它们都是把文本作为完成了的实体、一个外在的客体来看待的。同时,两者也都忽视了批评实践本身的能动性。作为阐释对象的文本与文本客体不是一回事。阐释的对象是文本客体与阐释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阐释视野之外存在着的是作为“物”的文本,作为阐释活动之组成要素的是作为涵义整体的文本。因此,作为对象的文本总是被阐释行为所重构,文本的意义就来自于作为重构的阐释实践,这种实践既是语言学的,也是意识形态的,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历史的。一切阐释都是对文本的强力重写,阐释的过程是符码转换的过程。这就是说,文本的确是透明的符号堆积物,但是这种不透明性不是由于某种稳定封闭的语言结构自

---

① 把这一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结构作比较是有趣味的。当拉康指出,“无意识是大写他者的话语”之时,事实上就标明了本我与超我的“同源性”,即“父亲之名”,这一概念同时包含了稳定不变的俄狄浦斯情结和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家庭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内涵。这为我们调和语言结构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稳固抽象的语言结构也许正是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符号化的投射。